

“共通”与“差异”： 汉语国际传播的跨文化美学阐释

曹 沸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 自汉语国际教育进入国家战略以来,世界范围内学习汉语的人数不断增多。随着国际中文教育在全球的深入开展,各文化审美观念之间的差异和接受度问题日渐凸显。文章通过对汉语及其在跨文化过程中涉及的审美意象进行分析,探究基于美学共通性和差异性的跨文化意象构建,寻找美学阐释在汉语国际教育实施中的可能性。

关键词: 审美意象; 跨文化; 美学阐释; 汉语国际教育

中图分类号: H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22) 06-0263-06

2007年伊始,作为语言教学的汉语国际教育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汉语国际教育是世界各国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和文化载体,外国汉语学习者书写汉字,学习汉语文本的过程,其实也是中华美学精神传播的过程。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审美角度和价值观的不同,各国汉语学习者对汉语文化意象的理解存在差异,甚至完全不同,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大多汉语学习者仅停留在听懂对话或认读汉字的层面,无法真正理解汉语会话中的隐性含义,更不用说欣赏用汉字书写的文学作品,更是难以进入中国文学作品的审美境界。其次,大多汉语学习者无法将中华民族的艺术作品当成审美对象看待,无法将诸如“柳树”“鸿雁”“月亮”等中国文学作品中托物言志的“物质对象”转化为“审美对象”。再次,即使高水平汉语学习者能够欣赏和理解中国文化中的“审美意象”,但对审美意象的解读也会有一定差异。

面对汉语国际传播中遇到的诸多跨文化误解,胡范铸提出必须明确汉语国际传播的任务究竟是“培养外国人的汉语交际能力”还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他认为汉语国际教育可以分为五个层次,即“汉语能力获得—交际能力建构—经济利益实现—中国文化传播—中外社会互动”,根本目标应该还是“中外社会互动”。^①“中外社会互动”落实到汉语的国际传播上,与加强各国对汉语国际传播的接受度及各国的“国际理解”理念息息相关。汉语作为一种语言符号,除了一般的外延意义,还具有更深厚的内涵意义。本着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立场,我们有必要从全球化角度对汉语中的跨文化审美意象进行美的探析和创造性阐释,赋予汉语国际传播以新内涵和新动力,展示和合文化引领下的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魅力。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BY123); 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2020SCG018);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21JD29)。

作者简介: 曹沸,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 汉语国际教育。

^① 胡范铸等《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目标与核心理念》,《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一、汉语审美意象探析

关于跨文化美学构建的方法，李一帅将学界目前的观点大致总结为两条路径，一是从美学的“共通性”视角进行构建，一是从“差异互补性”视角进行构建。他提到“不管是朱光潜的‘共通性’跨文化美学还是宗白华的‘互补差异性’跨文化美学，都积极地对中西美学做出了融合，但都是立足于西方美学跨进中国美学的立场，中国美学却极少主动跨进西方美学的领域。”^① 汉语国际传播正是中国美学主动“跨”进西方美学领域的一次积极尝试。要实现跨文化的美学精神贯通，可以先针对汉语进行有关符号系统的分析研究，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对汉语进行解码编码，尝试挖掘它潜在的语言符号之间的可译性，寻找跨文化艺术审美的共通性。

1. 汉语的韵律之美

汉语是具有强烈音乐性的语言。其音节组成中，往往少不了元音，而元音又可归入乐音。音节组合中的双声、叠韵等，结合汉语特有的声调，它的韵律之美就在抑扬顿挫的节奏变换中得到体现。

古人在吟诗作对时，常会利用双声、叠韵等修辞手段，赋予诗句韵律和生命。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起初便是人们唱诵传承下来的，如今具体的唱法虽已无处可寻，但我们仍能从那些带着韵律感的“关关雉鸣，在河之洲”或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中感受汉语韵律所传达出来的饱满形象和丰富情感。

2. 汉字的意合之美

汉字是在象形表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文字，具有意象性的特征。以汉字“美”为例，这个字暗含了中国人的传统审美观念，对“美”进行解构分析，可以得到上“羊”下“大”的理解。对此，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认为“美”字作“羊大为美”之义，即大羊肥羊就是美，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后来历史上“以胖为美”的审美观念。也有学者认为“美”字作“羊人为美”之义，是一个佩戴羊角的人，体现了当时对羊图腾的崇拜。^② 但无论何种分析，都能看出古代生活中，羊与人们的生活起居息息相关，也进一步反映了中国造字之初，对于美的认识，是与人的生命活动联系在一起的。

3. 古典诗歌的意象之美

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的发展，传统诗歌中一字一音所表达的汉语独有的美学意象，已成为联系中外文化的重要纽带。新冠疫情爆发后，在日本捐赠给中国的物资包装箱上就出现了诗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此诗句为唐代日本长屋王赠与唐朝僧人袈裟上的偈语；当日本疫情严重时，中国捐赠物资的包装箱上写有“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诗句。此后，在中韩、中法、中意的疫情捐赠物资的包装箱上都出现了中国古典诗句。无论是日本长屋王的偈语，还是《诗经》或唐诗中的诗句，都包含作为高语境文化载体的汉语所表达的思想 and 意图中的意象之美。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在1976年提出了高语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和低语境文化（low-context culture）两个概念。高语境文化指交际时“绝大部分信息或存在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极少存在于编码清晰的被传递的信息中”^③，而低语境文化则与之相反，交际中显性语码负载信息较多，社会文化环境和情景负载信息较少。M. W. Lustig 和 J. Koester 等学者则将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特点概括为——高语境文化：内隐、含蓄、暗码信息较多；低语境文化：外显、明了、明码信息较多。^④

① 李一帅 《构建跨文化艺术美学的难点思辨》，《美育学刊》2020年第2期。

② 高建平 《“美”字探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③ 胡超 《高语境与低语境交际的文化渊源》，《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4期。

④ 贾玉新 《跨文化交际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

中国诗歌的朦胧美、含蓄美等都是通过典型意象表现出来的，如“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和“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分别以“山川”“风月”“木桃”“琼瑶”为情感承载意象，表达了中外各国人民在困境当下守望相助的深刻含义。这说明汉语在国际传播中，诗歌中某些审美意象引起的人们的共鸣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情感体验，这种对于审美意象共同的情感体验就是各民族在审美上的同质性。

二、汉语国际传播中跨文化美学符号的转化

20世纪初两位美学大师朱光潜和宗白华试图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美学理论——跨文化美学理论。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分别提出了跨文化美学研究的两种维度。朱光潜认为中西方艺术和文化在广义层面有许多共通之处，因此他提出中西方美学相联系的“共通性”理论。^①而宗白华认为中西文化有本质的差异，他立足民族文化的“个性美”，通过对比中西绘画中蕴含的美学思想，来强调“差异互补性”在跨文化美学构建上的重要性，^②这恰恰证明了中国文化对世界的价值和贡献。这与美学中“距离说”^③不谋而合。但这里谈到的“距离”，并非时空距离，而是文化上的距离。尤其在跨文化审美的过程中，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会被放大，若过于注重本国文化而忽视了其他思想潮流，则容易拉大文化之间的距离，出现文化保护主义的倾向；若一味寻求文化的共融性，则容易模糊文化与文化间的界限，失去民族文化的“个性”。故一方面，审美活动双方之间要保持合适的距离，而另一方面，在审美活动中客体最能打动主体的时候，往往是在主客体相融，即两者距离最近之时，这样才能达到文化距离理论上的理想化状态。

在中国美学理论构建的过程中，大部分的理论都以西方美学为标杆，例如在与西方绘画“写实主义”相比较的过程中，中国美学总结出“中国画”具有“气韵生动”“笔墨”“虚实”等特征。除了艺术以外，在英汉语言对比的过程中，语言学家提出了英汉语言的“意合”和“形合”之别，叶子南认为汉语是形态缺乏的语言，英语是形态比较丰富的语言。^④因此，中国美学思想大多受西方美学精神和理论影响，而中国民族文化中的美学思想并没有对西方美学产生较大的、深层次的影响。因此，在这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中，进一步扩大中国美学精神对世界的影响是一个重要问题，而汉语国际传播中的跨文化美学阐释可以说是西方世界接受中国美学、中西文化达到融合的有效途径。

在汉语的国际传播中如何实现跨文化的审美沟通？顾恺之说过，要画出嵇康诗中的“手挥五弦”，在于形似，故为易；而要画出“目送归鸿”，则要达到神似，是为难。这是美学上所说的“表象转化的美感现象”^⑤。在跨文化审美意象的构筑中更是如此，它需要审美双方参与，对作品进行分解和重塑，凸显其中的共情部分，以获得趋向一致的审美体验。

1. 汉语国际传播中跨文化美学符号“差异性”的转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具备符号的本质特征。语言有口语和书面语两种形式，汉语的书面语用汉字记录，英语的书面语用拉丁字母记录。人类以语言为媒介进行交流和沟通，决定了语言作为各民族交流的主要方式必将存在差异和转化。

虽然汉语缺乏形态，汉字却比拼音字母蕴含更多的信息。文字作为语言符号，其性质是由这种文

^① 参见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0年，第350页。

^② 宗白华《艺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6页。

^③ Edward Bullough, “‘Psychical Distance’ as a Factor in Art and an Aesthetic Principl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5, No. 2, 1912, pp. 87-117.

^④ 叶子南《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⑤ 仲霞《中西审美现象学的时空结构差异》，《学术月刊》2017年第6期。

字所使用的符号性质决定的。各种文字所使用的符号，大体上有三类：意符、音符、记号。^①作为拼音文字之一的英文主要使用音符，汉字则三类符号都使用。对于母语为拼音文字的汉语学习者，认读和书写汉字是其学习汉语的难点，要理解汉字的美学内涵更是难上加难。在汉语国际教育中，许多欧美学习者对汉字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团杂乱无章的图画，无从记忆，也很难书写。以书法艺术为例，在书法欣赏中，即使会认读汉字的西方学习者能看懂汉字，弄清所写汉字的意义，但对于每个字在横竖撇捺间所传递的不一样的“气韵”和“情感”，西方学习者是难以理解的。早在19世纪初，索绪尔提出了语言即符号的观点。具有符号图像特点的汉字也遵循着符号学转化的规则，即“符号—图像—记忆”的规律，普通的汉语学习者也是遵循这条规律来认读汉字。但中国书法的视觉美学和西方拼音文字的视觉美学完全不同，我们可以从“差异互补性”的角度对前者进行跨文化美学阐释。

在汉语国际教育中，考虑到中西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可以从图像化角度解构汉字，通过汉字的古今对比，梳理造字之初与当今时代潮流偏向视觉化的发展脉络，让学生感受汉字传达的美感。图与画是没有国界的，用艺术和美学的眼光来看待汉字教学，将汉字学习的过程图像化，令学习者觉得“学汉字就像在看画，写汉字就像在画画”。依此产生的审美体验，能使更多人真正欣赏到汉字之美，轻松学写汉字。

2. 汉语国际传播中跨文化美学符号“同质性”的转化

一种语言的构造特点与该民族语言的语音特点是密切相关的。汉语是典型的声调语言，对音高变化特别敏感。英语虽然也有音高变化，但只是表现为语调，英语中可以和汉语的声调一样起到辨义功能的是重音，所以说英语是一种重音语言。从听觉角度，汉语英语通过声、韵、调强化了听觉符号在交际中的重要作用，透过语言这一听觉符号去传达情感，具有独一无二的适用性和接受度，同时还适当减少了语言符号在跨文化过程中的一些限制作用。例如诗歌，无论汉语诗歌还是英语诗歌在关注“意美”的同时，都强调“音美”。汉语诗歌和英语诗歌都注重诗歌的抑扬顿挫的节奏美，说话人用劲不一样，音节就会有高低、轻重、快慢、长短的变化。汉语诗歌和英语诗歌的音步对音节都有要求，汉语律诗尤其严格，五言律诗的音步是2+3，七言律诗的音步是2+2+3。以张继的《枫桥夜泊》为例，其音步内的音节构成模式为：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汉语诗歌这种整齐划一的音步节奏美在读和诵的过程中也注重轻重原则。以诗歌《枫桥夜泊》为例，其第一行中的轻重规律应是“月落”“乌啼”这两个音步中的第二个音节“落”和“啼”比“月”和“乌”重些。该诗句中“月落”“江枫”“姑苏”“夜半”音步的两个音节在普通话中都是同一声调，从这一角度看，汉语的律诗比英语的律诗严格得多。虽然英语诗歌很难做到音步与语言基本结构单位、音节相协调，但英语诗歌也注重节奏美。以英国诗人休姆的《堤岸》为例（黑体是重读音节，其余为轻读音节）。

The Embankment

by Thomas Ernest Hulme

(The fantasia/ of a/ fallen **gentle**-/man **on** /a **cold** , / bitter **night**)

Once ,

in **finesse** /of **fiddles**/ found **I** /ecstasy ,

In a /flash **of**/ gold **heels**/ on **the**/ hard **pavement**.

Now see **I**

That **warmth's**/ **the** very **stuff**/ of **poesy**.

Oh , God , make **small**

The **old**/ star-**eaten**/ blanket of/ the **sky** ,

^①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0-11页。

That I/ may **fold**/ it **round**/ me and/ in **com-**/fort lie.^①

该诗的基本音步按“轻一重”形式组织，第五行和第六行的 I 和 the 通常应轻读，但为了节奏的需要而重读，与汉语诗歌相似，这也是英语诗歌的格律模式对节奏整合的结果。英语每一行诗的词的多寡不同，每一个词的音节数不一样，轻重交替的音步也不一样。英汉语诗歌在不同的美学传统背景下，通过各自的风格表现出相似或相异的美学价值。这种语言之间美学成分的认同并不是通过单纯的语言来实现，西方人对汉语诗歌的审美认同是需要结合汉英诗歌同质性因素，整合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和相关的认知图式来完成的。汉语国际传播的任务就是找到中外文化审美中的同质性因素，使文化背景不同、国别不同的人在赏析汉语语篇（短文、诗歌等形式）的过程中产生共情，从而实现语言之间的可译性和美学上的互通性。

三、汉语国际传播跨文化审美阐释的可行性

李庆本认为跨文化审美存在“理解”和“认同”两个层面的问题。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中同样存在着“理解”和“认同”，中国人对称呼外国人为“老外”早已习以为常，认为这是汉语对外国人的一种特定称呼，但大多数外国留学生并不认同这一特定称谓，很多留学生认为“老外”这一称呼说明中国人具有排外心理。殊不知，在中国文化范畴内，“老外”是对外国人的一种亲切的称呼。李庆本还提出“理解”和“认同”两个层面的关系“理解了但不认同，这也是在跨文化审美欣赏中常见的现象。我们并不要求跨文化审美欣赏一定达到认同的层面。只要能理解，就算是成功的跨文化审美欣赏。”^②因此，在汉语国际传播过程中，做到有效的跨文化审美阐释，达到在异文化范畴内一定的理解仍有一定的可行性。

1. 接受美学视域下的审美阐释

“接受美学”理论主张从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出发，充分承认读者对作品意义和审美价值的创造性作用。汉语国际传播过程中，如何让学习者接受汉语和中华文化的美，唤起外国学习者的共鸣，减少审美差异，填补认知空白，这都需从“接受美学”视角来进一步探究。最有效的切入点便是召唤汉语学习者在接受过程中动用人类共有的审美经验和生活经验来阐释中华文化。

在人类的诸种精神领域中，对美的追求是人类共有的天然本性。早在《诗经》中就有诗句“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来描写卫庄公夫人庄姜高贵、美丽的形象。同时代的《荷马史诗》描写女神雅典娜也多集中在眼睛，如那双“灰蓝眼睛”“闪亮明眸”“目光炯炯”等词语。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在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和社会富足的同时，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和共建美好生态的愿景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海德格尔提出“诗意栖居”这一人类理想生存状态，这与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念十分相似，本质上都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方式与境界。人类所具有的某些共同性要求汉语国际传播跨文化美学阐释需要寻求横跨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共同规律，从而获得一种精神沟通。

2. 民族性与全球性视域下的审美阐释

汉语与其他语言是不同思维和文化体系的产物，它们各有不同的历史演化过程、社会土壤和文化环境，任何汉语学习者都是从自己的文化视角来理解和欣赏汉语文本和艺术作品的。如果汉语学习者在具体的审美欣赏中能够认识到这种文化的差异性，显然对于从“他者”视角审视或欣赏具体的艺术作品和汉语文本会有更大的帮助。几千年来，汉语和词汇在不断演化，汉语文学艺术作品中丰富的内涵并不是只能从本土文化这一单一维度加以解释。在汉语学习过程中，外国学习者总是受到母语正

^① Thomas Ernest Hulme, “The Embankment,” 转引自 <https://poets.org/poem/embankment>, 访问时间: 2022年4月13日。

^② 李庆本《跨文化审美欣赏的四个维度》，《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

负迁移的影响,母语正迁移能促进汉语二语的学习,而负迁移则影响或阻碍二语学习。不同文化的审美也同样存在着正负迁移的作用,文化的理解和认同过程不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接受和被接受的关系,而是在差异的基础上,主体间的价值判断和互动发展。我们必须承认,本民族文化内部也存在着差异性和多样性,何况汉语学习者基于自己母语和“前理解”的文化立场从异文化的角度阐释汉语和中华文化的独特内涵。中外文化差异性可以为汉语学习者提供欣赏异文化的新路径,在全球化的今天,以汉语为载体传播中华文化,可以达到中外文化有效互动的目的。

3. 信息技术发展下的审美阐释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类不断增长的跨文化审美需求为汉语国际的有效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为汉语国际传播提供了更新、更高效的传播途径,也为审美体验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线上汉语国际传播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将中国社会生活与文化艺术融入汉语国际教育中,多角度地展示中国古老文化的魅力及当代中国的活力。“处于中西古今多维时空之中的中国‘美学’……实际上隐含着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时代语境中对中国美学‘民族性’与‘本土性’的强烈诉求。”^①

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我们看到了很多国际中文教育的新形态,例如近年来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推出的“汉语桥—云游中国”系列课程,这些课程都与信息技术的“数字审美”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当下,“数字审美”培育新的审美需要,生活和数字技术的界限日益模糊,贯穿其中的数字审美快速兴起。在数字技术深入影响的新媒介时代,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语言和文化的输出与艺术审美、数字审美与接收主体之间的关系。数字技术支持下的汉语国际传播新媒介颠覆了传统的传播方式,随着“全球化”与“现代化”语境的到来,信息技术同语言、文化一道成为了现代人表达审美需要的新舞台,汉语国际传播正展现出新的多样的数字审美形态。

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与跨文化传播的新理念为汉语国际传播的跨文化美学阐释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汉语国际传播需要将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精神与思想的细节融合至时代的大背景中,传播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美学,这是避免文化冲突产生的有效途径。

结 语

20世纪初期开始,蔡元培、宗白华、朱光潜等美学家就渴望从中西美学的“共通性”“互补差异性”等视角构建跨文化艺术美学,蔡元培先生更是身体力行地大力推广美育。重视汉语国际传播中跨文化审美意象的作用,正确认识汉语国际教育在文化传播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能够为汉语的跨文化审美开辟语言互译以外的途径,即通过跨文化美学符号的“差异性”和“同质性”转化,寻找中外审美上的共同性,为汉语及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进一步传播和扩展提供新的可能。当然,上文论及的方案也仅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汉语国际传播中跨文化美学意象的理解问题。汉语国际传播中的审美融合,更需要汉语教师用语言和文化中的具象来阐释美学的共通性和差异性,从而让中国的美学理念、中华美学精神以至于中华文明,通过汉语的国际传播而被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和世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王艳丽

^① 杨吉华 《“Aesthetics”的意义转移与“中华美学”的历史进路》,《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